

吴中杰评点

吴中杰 编著

鲁迅杂文上册

复旦大学出版社



吴中杰评点

吴中杰
编著

鲁迅
杂文
上册



复旦大学出版社

序论：重新解读鲁迅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强调“文艺必须服从于政治”，并以政治立场作为评价作家的首要标准，因而在鲁迅研究工作中，就较多地从政治的角度来阐扬鲁迅精神，在各种选本中，大抵也选录他与政治关系密切的文章为主，而且，还把他曾经说过的“遵命文学”一语，当作一种口号来宣扬，从而把鲁迅塑造成一个“服从政治”的作家，供人效仿。

然而，这种政治化了的鲁迅，并非真实的鲁迅。鲁迅是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坚持自己独立思想的作家。

早在1907年所写的文章中，鲁迅就提出了“掇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主张，五四时期，他又提倡“个人的自大”，反对“合群的自大”。这都是个性主义的表现，强调的是个人思想的独立性。1927年底，他在上海暨南大学作过一个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演讲，很可注意。在这篇演讲中，他强调的是：“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他说：“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文学家则喜欢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对于社会现状不满意，这样批评，那样批评，弄得社会上个个都自己觉到，都不安起来，自然非杀头不可。”鲁迅在这里所说的，大概不只是过去，而且也预测着未来，这是一种普遍规律。正因为发表独立见解之难，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一向少有独立文人，而多“帮闲文人”和“帮忙文人”。20世纪30年代，鲁迅写了许多批判“帮闲文学”的文章，并且指出，屈原的《离骚》，也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此论的要点，就是反对文人对于权力的依附，而要求文人有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思想。

不错，鲁迅在特定情况下，对于自己的创作，也曾说过：“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这里，“也可以说”几个字，已透露出几分勉强的意思。而且，接下去他就说：“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①而这所谓遵

① 《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

奉“革命前驱者的命令”，也只是“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的意思，并非真的接受什么人的命令。

其实，鲁迅一向是反对奉命写作的。他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说过：“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鲁迅自己就一向坚持独立思想的，即使到后期，他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同情共产主义运动，但也仍是根据自己的思想感受写作，而不愿接受什么人的指令。1930年5月7日，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实际负责人李立三约鲁迅至爵禄饭店谈话，要求鲁迅像法国作家巴比塞一样，发表一个支持共党政策的宣言。鲁迅对于当时共产党的左倾政策，本来就心存疑虑，而且，公开发表宣言，等于是要他赤膊上阵，与他一向所主张的壕堑战思想不符，所以为他所拒绝。鲁迅回家之后说：“我们两人各人谈各人的。要我像巴比塞那样发表一个宣言，那是容易的；但那样一来，我就很难在中国活动，只得到外国去住起来做‘寓公’，个人倒是舒服的，但对中国革命有什么益处！我留在中国，还能打一枪两枪，继续战斗。”^①1936年，鲁迅与上海文艺界地下党负责人周扬等人的公开冲突，亦非偶然，而且它的内涵也不仅限于解散左联问题和两个口号论争。早在这之前，我们在鲁迅致胡风、曹靖华等人的书信中，就看到他称周扬等人为“英雄”、“元帅”、“工头”、“奴隶总管”，指责他们的领导作风，并且说：“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②这里所表示的，显然是对于他们那种东方式的专制主义领导思想和领导方式的不满。从周扬等人后来的回忆录和访谈录看，他们总以为自己是按组织原则办事的，并不认为有错。即使有什么错误，也只是对鲁迅这样一个特殊人物——被作为左翼文化旗帜看待的左联盟主，有不够尊重之处，却并不觉得需要尊重一个作家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而问题恰恰在于，他们所坚持的这种思想原

① 据当时陪同谈话者冯雪峰的回忆，见《雪峰文集》第4卷，第537—53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 1935年9月12日致胡风信。

则和领导方式，与鲁迅所坚持的文人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原则，是互相矛盾的，这才是冲突的根源。

对于鲁迅的独立精神，即使非常尊重他的共产党员，也不能理解，而且颇有非议。据胡风晚年所写的《鲁迅先生》一文中回忆，两个口号的论争开始后，“国防文学”派放出流言，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托派的口号，这时托派人物乘机给鲁迅写了一封“拉拢”的信，鲁迅非常生气，但他正在病中，无力起坐，也无力说话，《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由冯雪峰代写的。冯雪峰约胡风一道拿着拟稿去看鲁迅，把拟稿念给他听，“鲁迅闭着眼睛听了，没有说什么，只简单地地点了头，表示了同意。”冯雪峰回去后，觉得对口号本身也得提出点理论根据来，于是又拟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又约胡风一道去念给鲁迅听。“鲁迅显得比昨晚更衰弱一些，更没有力气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但略略现出了一点不耐烦的神色。一道出来后，雪峰马上对我说：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都是党派给他的秘书写的，他只是签一个名。”而鲁迅自己的意见呢？胡风说：“到病情好转，恢复了常态生活和工作的時候，我提了一句：‘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语气倒很像……’鲁迅淡淡地笑了一笑，说：‘我看一点也不像。’”显然，鲁迅是不满于这种越俎代庖的做法的，他不愿意被利用。这使我们想起他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中所写之事：《晨报》因《语丝》的发行，颇受到一些打击，派人来与孙伏园说和，孙伏园在得意之余，忘其所以，曾以胜利者的笑容，笑着对鲁迅说：“真好，他们竟不料踏在炸药上了！”这话，对鲁迅刺激颇深，他说他听了之后，“却好像浇了一碗冷水，因为我即刻觉得这‘炸药’是指我而言，用思索，做文章，都不过使自己为别人的一个小纠葛而粉身碎骨，心里就一面想：——‘真糟，我竟不料被埋在地下了！’我于是乎‘彷徨’起来。”这两件事，表面上看来，很不相同，但就内中所反映出来的鲁迅思想性格而言，却是一致的。

后来，那些高举鲁迅旗帜的人，对于鲁迅这种独立性格，也是不予肯定的。据说，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萧军发言说，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并举鲁迅为例，说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胡乔木起而反驳道：鲁迅当年没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而胡

乔木的发言,则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①。可见他们对于鲁迅还是有保留看法的,只是由于政治上的需要,而不特别说出,却从另一方面突出地强调鲁迅曾经说过的“遵命文学”的口号。

当然,坚持作家的独立意识,不赞成文艺服从于政治,并不等于说文艺应该脱离政治。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据我的意见,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这里所说的政治,是宽泛意义的政治,是指人间世事而言,而并非指政治家的政治。所以鲁迅的创作,并非服从于某种政治路线,而是着眼于社会人生。他写作大量的杂文,主要是从事于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亦即批评中国的旧社会和旧文明。

从本质上看,鲁迅是位思想家。他之所以从事文艺运动,如他自己所说,是以为文艺最善于改造国民精神。而他之所以被称为革命家,则是由于他在文化革命上的功绩。他是一位文化思想上的革命家,而非政治革命家。人们往往以为思想家必须有一个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或者是有一种可资号召的主义。其实并不尽然。历史上有许多思想家是将对现实理解的深刻著称,他们虽然没有哲学体系,也不标榜什么主义,但他们的文章和言论足以启迪人心,引导人们前进,对时代所起的作用,远胜过书斋中创造出来的那些体系和主义。鲁迅就是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理解得非常深刻的思想家。读鲁迅的著作,特别是读他的杂文,能培养我们的观察力和思考力,有助于我们对现实问题的理解。

鲁迅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著称,但是,他的着眼点显然不在于各种文化派别的“原教旨”,而在于它们对于后世的影响。也就是说,鲁迅是从现实情况出发来评价传统文化,并决定对它的取舍的。他有一篇杂文的题目是:《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就说明他注重的是儒学在现实中的作用,或者说,现实中的权力者是如何利用孔夫子来为自己谋取利益的。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是:“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

^① 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①这句话有排山倒海之势，看似非常激烈，但是并不盲目。他是从现实需要出发，要踏倒的是有碍于生存、温饱发展的东西，而不是有利于生存、温饱发展的东西。在另一篇杂文里，他更明确地说出了他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②同样从这一立场出发，他提出了“拿来主义”。这种“主义”要求我们根据本国的需要，放出自己的眼光，来吸取外国文化，而不是任外国人送来有害的东西。这种文化态度，至今看来，仍是可取的。

正因为鲁迅是从实际出发来看待文化问题，所以他的文明批评总是与社会批评联系在一起，从社会问题出发，来挖掘旧文明的根子。如：从儿童被压抑的精神状态，来批判以长者为本位的孝道；从照相之类，发掘中国人的保守思想和畸形审美心态；从铜镜纹饰的变化，看历代不同的文化心态；从袁世凯称帝时货币贬值所引起的恐慌，悟出中国的历史，实质上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从“面子”问题，挖出国民思想的虚假性；从《论语》派之提倡超脱现实，剖析隐士文化的矛盾性，等等。即使有些没有直接与某种文化传统相联系的社会思想，它的形成，也是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的。鲁迅的杂文，既有现实的针对性，又有历史的纵深感，所以具有它的深刻性。

既然有现实针对性，就必然要介入社会斗争。在斗争中，鲁迅始终站在社会正义这一边，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并且用他锋利的笔，戳穿虚伪的假面，揭出麒麟皮下的马脚来。

有些人指责鲁迅的文笔太尖刻，说他太喜欢骂人，但从论战的实际情况看，鲁迅倒常是后发制人的。比如，梁实秋以“卢布说”的大帽子来扣左翼作家在先，鲁迅才骂他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拿卢布”在当时是可以置死的罪名，而“乏走狗”之类，则只不过是揭露性的言辞而已。所以鲁迅主张出版杂文集子时，应将对方的文字也收入，才能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否则还以

① 《华盖集·忽然想到(六)》。

② 《热风·随感录三十五》。

为一方在对空打太极拳。现在,对手的文字大抵已经泯灭,于是只觉得鲁迅的杂文尖刻了。

但是,要读懂鲁迅的杂文,也确实不很容易。这需要有相当的社会阅历和历史知识。鲁迅在1936年4月2日复颜黎民小朋友的信中,就说:“拿我的那些书给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看,是不相宜的。要到三十岁,才很容易看懂。”而一旦读懂了,那就会得益无穷。每读一遍,就会有更深一层的体会。中国近现代社会,表层的变动虽然很大,但深层文化却触动不够,旧的思维模式保留得很多。鲁迅所批评的是深层文化,所以他的杂文至今读来,仍很有现实感。当然,这也并非好事。正如鲁迅自己所说:“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①

鲁迅自然也有缺点,也有判断失误之处,也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就总体而言,他的大多数见解,至今看来,仍是正确和深刻的。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这是非常难得的。因此,他的影响力经久不衰。但也正因为他的影响力太大,有些青年作家觉得他妨碍了自己形象的树立,所以把他当作一块“老石头”,想要踢开他。这种情况并不新奇,在鲁迅生前就有。所以他在《三闲集》后面附印了自己的译著书目,并且说:“对于为了远大的目的,并非因个人之利而攻击我者,无论用怎样的方法,我全都没齿无怨言。但对于只想以笔墨问世的青年,我现在却敢据几年的经验,以诚恳的心,进一个苦口的忠告。那就是:不断的(!)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载,几篇文字和几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还有一点,是:不要只用力于抹杀别个,使他和自己一样的空无,而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初初出阵的时候,幼稚和浅薄都不要紧,然而也须不断的(!)生长起来才好。”这段话,对于今之某些想否定鲁迅的青年作家,大概也仍然适用的。

鲁迅不是靠人为的吹捧而伟大,他是以自己的作品显示出他的不朽。拂去鲁迅身上涂抹的东西,这才是真的鲁迅,伟大的鲁迅。

① 《热风·题记》。



吴中杰 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1936年出生，195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长期从事文艺理论、鲁迅专题、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和中国古代审美文化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同时兼写杂文随笔，对知识分子问题多所关注。主要学术著作有：《论鲁迅的小说创作》（与高云合作）、《论鲁迅的杂文创作》、《鲁迅文艺思想论稿》、《鲁迅画传》、《海上文谭》（与高云合作）、《文艺学导论》、《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论》（主编）等，并评点鲁迅作品；主要散文集有：《人生大戏场》、《旧途新旅》、《海上学人》、《复旦往事》等。他所主持的“文艺学系列教材建设”项目，曾获2001年度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目录

1918 年

我之节烈观	3
随感录二十五	11
随感录三十五	14
随感录三十六	16
随感录三十八	18

1919 年

随感录三十九	25
随感录四十	28
随感录四十一	31
随感录四十三	34
随感录四十八	36
随感录四十九	38
随感录五十四	40
随感录五十六 “来了”	42
随感录五十七 现在的屠杀者	44
随感录五十九 “圣武”	46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49
随感录六十一 不满	59
随感录六十五 暴君的臣民	61
随感录六十六 生命的路	62

1922 年

- 67 估《学衡》
- 71 无题
- 73 所谓“国学”
- 75 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 77 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1923 年

- 81 关于《小说世界》
- 83 娜拉走后怎样

1924 年

- 91 未有天才之前
- 95 论雷峰塔的倒掉
- 97 说胡须
- 102 论照相之类

1925 年

- 111 咬文嚼字(一)
- 112 忽然想到(一)
- 114 忽然想到(二)
- 116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 120 看镜有感
- 123 咬文嚼字(二)
- 124 青年必读书
- 126 忽然想到(三)
- 128 忽然想到(四)
- 130 论辩的魂灵

通讯(致徐旭生一)	132
牺牲谟	134
战士和苍蝇	138
通讯(致徐旭生二)	140
夏三虫	143
忽然想到(五)	145
忽然想到(六)	147
春末闲谈	149
灯下漫笔	153
杂感	159
北京通信	162
忽然想到(七)	165
导师	167
长城	169
忽然想到(九)	170
“碰壁”之后	172
俄文译本《阿 Q 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177
忽然想到(十)	180
杂忆	183
忽然想到(十一)	189
补白	194
论“他妈的!”	201
论睁了眼看	204
女校长的男女的梦	208
答 KS 君	210
《热风》题记	212
十四年的“读经”	214
评心雕龙	217
并非闲话(三)	219
坚壁清野主义	224

227	寡妇主义
231	这个与那个(一)——读经与读史
233	这个与那个(二)——捧与挖
235	我观北大
237	这个与那个(三)——最先与最后
239	这个与那个(四)——流产与断种
241	碎话
244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251	《华盖集》题记

1926 年

257	学界的三魂
260	一点比喻
263	我还不能“带住”
266	送灶日漫笔
269	谈皇帝
271	无花的蔷薇
275	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
277	无花的蔷薇之二
281	“死地”
283	可惨与可笑
285	纪念刘和珍君
290	空谈
293	再来一次
296	记谈话
300	《未名丛刊》与《乌合丛书》广告
301	厦门通信
303	厦门通信(二)
305	写在《坟》后面
310	《阿 Q 正传》的成因

1927 年

《绛洞花主》小引	319
无声的中国	321
老调子已经唱完	326
黄花节的杂感	332
略论中国人的脸	334
革命时代的文学	337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343
读书杂谈	346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351
通信	363
答有恒先生	367
反“漫谈”	372
可恶罪	375
扣丝杂感	376
怎么写(夜记之一)	382
小杂感	388
革命文学	392
关于知识阶级	394
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400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402
文学和出汗	408
谈所谓“大内档案”	410

1928 年

“醉眼”中的朦胧	417
文艺与革命	422
扁	425
太平歌诀	426

- 428 铲共大观
430 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434 文学的阶级性
436 敬贺新禧

1929 年

- 439 “革命军马前卒”和“落伍者”
440 《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
442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446 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
449 柔石作《二月》小引
451 流氓的变迁
453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455 书籍和财色
457 我和《语丝》的始终

1930 年

- 467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481 文艺的大众化
483 习惯与改革
485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488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492 我们要批评家



京师图书馆开馆纪念摄影，第二排左起第五人为鲁迅

1918年

鲁迅

杂文

